

# 你在他乡还好吗

——来自民间视角下的农民工幸福状况调查报告（上）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课题组



2011年12月

## 编者按

为什么要做一次关于农民工“幸福”的调查？

建设“幸福中国”、“让人民更幸福”正在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十二五”规划的主旨也将发展重点转向“以人为本的经济增长”，将“人民的生活”和“生活质量”置于经济快速增长之上。

农民工作为支撑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幸福指数不仅关系到该群体的工作生活质量，也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质量。作为致力于为农民工提供公益服务的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在过去的两年里，深切感受到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生活质量的关注。而另一方面，在以经济为核心的社会生活中，主流社会依然忽视着农民工作为“人”的精神发展和实现人生价值的需求，仅仅将其视为“廉价劳动力”，从就业角度出发的社会服务又进一步强化了农民工“劳动力”的角色期待。

我们的农民工兄弟，他们到底生活得怎样？他们认为的幸福究竟是什么？他们幸福么？在追求幸福的旅途中，哪些因素有利于他们目标的实现？哪些因素会障碍他们追求幸福的脚步？

我们认为，答案即在农民工的自我认识中；我们相信，农民工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此背景下，自2010年开始，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北京协作者）与伙伴机构南京市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南京协作者）、珠海市协作者社会工作教育推广中心（以下简称珠海协作者）联合开展流动人口“我的幸福生活”社会教育行动，通过对北京、南京、珠海三个东部沿海最具代表性的流动人口聚集城市的流动儿童及其家长、新生代农民工，一方面针对他们的现实需求，开展文化、健康、法律、亲子教育等系列公益服务，另一方面在服务过程中开展行动研究，通过系列“什么是幸福”的成长小组，以社会工作专业手法协助农民工澄清对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认识，并鼓励农民工以绘画、图片、文字故事、民众戏剧的方式，表达自我对幸福的认识和期望，进而向主流社会传递该群体对“幸福”的认识和期望。从而在促进农民工群体对自我发展认识的同时，促进主流社会与农民工群体的相互理解与支持。

在这些服务的基础上，2011年春节，北京协作者、南京协作者、珠海协作者三地社会工作者、打工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等，于春节返乡期间开展“农民工幸福状况调查”，历时近一个月，以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形式，继续深入研究农民工幸福话题，透视平凡人不平凡的幸福生活。

呈现在您眼前的这份文字记录，即是这次社会教育行动的产出，它既包括农民工朋友及流动儿童在参与协作者历时两年开展幸福主题服务中产生的故事、诗歌、摄影、绘画作品、民众戏剧等，也包括问卷调查与个案深度访谈的总结分析。它并非一份专业性的调查报告，或许有所偏颇，请您谅解。我们愿意与您分享我们的见闻。我们相信，这份来自民间视角的农民工幸福记录，将是建设幸福中国图景的重要构成，它的存在，本身即构成一种意义。

从2004年开始，北京协作者平均每两年开展一次农民工专题调查。8年前，当我们开展第一次调查时，调查的主题是“农民工生存状况”，而这次年，我们的主题是“农民工幸福状况”。由“生存”到“幸福”，其间种种让人心酸又喜悦。在成功地解决了



农民工最初级的生存需要之后，我们的社会、整个农民工群体已经在向着更高的需求，即对发展和尊严的需求迈进。

我们相信，这仅仅是个开始。如同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所言——“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我们愿与您共同见证。

作为一家致力于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创新的公益机构，我们希望借此报告，可以拓展农民工表达的途径，能够使更多关心农民工的人了解到这一群体的生活现状、具体需求，为这一群体构建幸福生活而携手努力。

与您分享。

——北京市协作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课题组

## 目 录

编者按

..... 第 3 页

你在他乡还好么——农民工幸福状况调查（个案篇）

..... 第 4 页

小丽说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照个全家福，这么些年了，愿望一直没有实现。这么些年，一大家子人，从来没有凑齐过。她期待的幸福，就是一家人在一起。

你在他乡还好么——农民工幸福状况调查（数据篇）

..... 第 10 页

调查显示，农民工认为与幸福有关的前三位主要因素中，家庭以绝对优势领先，占 78.2%；情感、事业位居二、三位，比例分别为 49.4%、41.4%；而收入因素位居第四位，占 40.2%。

你在他乡还好么——农民工幸福状况调查（建议篇）

..... 第 24 页

应珍视该群体对生活、对未来的信心，加快社会政策、服务的“均等化”、“普惠化”建设；激发农民工群体的潜在能力与价值，在社会经济建设中，充分调动农民工的参与。

## 个案篇

### 概述

2010年,中国以58786亿美元的GDP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奇迹的背后,离不开2亿4千万农民工的辛勤付出。

自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33年。33年间,渤海湾、长三角、珠三角工业区日渐浩大,伴随着的流水线轰鸣,“中国制造”流向世界各地。而一批批的农民工,在此重复着日复一日的单一生活,青春在流水线上流逝。

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农民工群体成为最先受到冲击的一群,而其以自身乐观坚韧,引领了中国经济复苏;2009《时代》杂志年度人物,“中国工人”以群体入选,被称为“带领世界经济走向复苏”;2010年,南方工业园区里十数个年轻生命纵身一跃,用鲜血再次把社会关注引向这一沉默的群体。

2亿4千万,这一庞大的群体,他们是中国社会最强大的力量,也是中国社会最深切的痛楚。他们以自身的涅槃,维护着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和谐发展。

每一个个体的幸福都不可替代,每一个个体的痛苦需要被理解。

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

### 流水线相伴的青春

打工者:小温

打工所在地:珠三角工业区

这一年正月,小温抵达南屏。十个月后,小温选择了离开。即便三年后,小温依然觉得这是生命中最伤心的一段。

“特别孤独,特别难熬。”小温一连用了两个“特别”。

2007年,珠海南屏科技工业区,高中毕业的小温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

小温打工的南屏,和西湖十景中诗情画意的“南屏晚钟”没有什么关系。这个南屏,是个面积4平方公里多的工业开发区。以此为起点,东去5公里可进入珠海市区,南下10公里则是澳门。就是这样一处小小的城镇,集中着500多家企业,4万余名打工者,2010年全年产值达到了721.5亿元。在工业园的网站上,骄傲地标明:同比增长19%。

这样的荣耀，似乎和身为打工者的小温没什么关系。2007年正月初七，高中毕业的小温第一次坐上长途车从家乡出发，一路颠簸一路吐，抵达珠海香洲。夜里下车，前来接应的姐夫花60块打了个车，他便来到了南屏。

从的士上下来，小温又是一通呕吐。吐干净了，他抬起头仔细打量这个自己即将开始新生活的地方，惊讶地发现，这么晚了，居然还有路灯！随着姐夫一路向家走去，小温的兴奋感逐渐消退。越走越深，越走越黑，灯光渐渐消失，只剩下天上点点星光，如同千里之外的家乡。推开房门的一瞬，小温愣住了，一张床，一个电视机，什么都没了。这是一个家么？

更大的失落在等着这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第一天上班，走进电子厂，眼前是破旧的厂房，流水线隆隆轰鸣。之前在老家电视上看到的那些个时髦场景，高楼大厦、舒适的办公桌椅、上上下下的电梯，统统没有出现。

开工。小温的生活如机器般开始运转。8点上班，12点下班；13点半上班，17点半下班。如果加班，通常加到21点半。

小温的岗位是烤料。电脑键盘上有层塑料膜要加热成型，小温的工作就是把这些覆在键盘上的膜放进烤箱。烤箱有300度，工作间的温度在35度以上，冬天穿短袖进去也会流汗。和小温搭档的是个大哥，40多岁了还没娶到媳妇。小温和他也没什么交流，平日里两人各自埋头干活儿。同在一个部门的还有几个年纪相仿的女孩子，小温很少和她们打招呼，也不知道该怎么招呼。人家来拿料，他头也不抬，说“在那里”。有时候下班一起走，女孩子们会拿他开开玩笑。她们觉得，这个小孩子实在太腼腆了。

腼腆的背后是孤独。在这片人挨人人挤人的工业区里，小温感到难以名状的孤独。晚上回姐姐家吃完简单的晚饭，小温会回到自己的宿舍。小温原本是住多人间，同宿的两个舍友喜欢抽烟喝酒，整晚打牌，瓜子皮嗑得满地都是。小温觉得生活习惯不太一样。有一天，旁边宿舍有个小房间空出来，小温赶快搬进去住。一张床那么大的一个房间，一个人住。清净了，但是更孤独了。

第一个月，小温拿到了798.5元的工资，此后900、1000左右。这些钱小温花得很仔细。每天早晨买一个包子，有时上个网，小温仔细计算着，月花销控制在200块以内，剩下的统统存下来，供二哥读书。

二哥是全家五个兄弟姐妹里唯一的大学生，是全家的希望。但一年的学费、生活费要一万多，对于小温家，这样的希望显得有些沉重。有一次要给二哥凑生活费，哥哥、姐姐们出了500、1000不等，小温一下子拿出1500元，觉得特别自豪。

小温的理想一直是当个军人，保家卫国。上小学的时候，小温大着胆子站到教室的讲台上向全班同学分享自己的理想，讲得太激动，下来的时候觉得浑身颤抖。直到现在，每当看到听到和军人相关的信息，小温还是难以抑制地起一身鸡皮疙瘩，汗毛竖立。高三毕业，小温报名参军，第三关落选了。乡亲们劝他，没后台，不行，还是打工去吧。小温哭了一场，随后收拾收拾行囊，向着南屏出发了。

十个月后，小温再度收拾行李，决定离开。

即便是三年后，回想起在南屏的日子，小温依然说，这是自己最伤心的一段记忆。伤心的不是低廉的劳动所得，不是辛苦的付出，而是孤独。“特别孤独，特别难熬。”小温一连用了两个“特别”。

离开的前一天，姐夫专门请了假带他去看看海滨公园。对于南屏，这个小温呆了 10 个月的地方，小温说“那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有个幼儿园，还有个和大福超市。”在这里最温暖的记忆来自当时姐姐家的邻居，一个同乡大姐。当年小温在等姐姐、姐夫下班时，大姐时常关照下他，有时也把自己家熬的鸡汤、鸭汤，端一大碗给他们。

2007 年 10 月，小温离开了南屏。

2008 年，东莞，小温成为了一名仓库管理员；2009 年至今，珠海，流水线工人。

提起未来的生活，小温迷茫而坚定，“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寻找一份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

## 小丽的幸福期待

打工者：小丽

打工所在地：珠三角工业区

小丽说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照个全家福，这么些年了，愿望一直没有实现。这么些年，一大家子人，从来没有凑齐过。她期待的幸福，就是一家人在一起。

如同小温一样，小丽的青春也在珠三角工业区里启程。

2010 年 3 月，小丽进入位于珠三角的一家日资企业，这家企业是世界 500 强，出产的小家电在中国家喻户晓。

厂子是大厂，工资却并不高，月均工资一千五左右。自小丽工作以来没有一个月的工资超过 2000 元。但福利待遇还不错，管吃住，买 5 险，还发生活用品和节日礼物。

为了进厂，小丽交了一百多元钱给中介。中介公司说，这笔费用包括办假高中毕业证的钱（中介说厂方要求以学生身份进厂）、成功费（保证能进厂）等。小丽觉得并不贵，“男孩子的，光成功费有的要交到五、六百呢。”

进厂的那天是 3 月 16 日，小丽清楚地记得这一天，因为难熬的日子由此开始。初来乍到，身边一个人都不认识，几个月的时间里，小丽把自己封闭起来，整天就是摁手机。同事一个都不认识，也常不在宿舍，回想起来，自己都不记得自己当时干嘛去了，反正晚上都是很晚回来，和宿舍的人少说话。七、八个人的宿舍，因为调动的原由，宿舍里的人只有 3 个是相互认识的，其他人之间互不交流。小丽适应了 2 个多月才适应过来。

小丽决心打破这种沉默。

在宿舍，小丽发现每个人买吃的东西回来放在桌上，其他人都不会去动，好像各顾各的，于是，小丽带头，买了吃的就招呼大家一起吃，慢慢的，其他人买了东西，也开始招呼大家一起吃了。而休息日，小丽主动留在宿舍没有出去逛，和另一个留下的室友一起看电视，看了整整一天，慢慢地，两个人就说起话来了。

人际交往方面的困境被小丽突破了，但另一重困境来自工作。

小丽的工作在业内被称为“QC”，即产品质量检测，是生产的最后一个环节。产品完成生产，做“QC”的工作人员检查产品是否完好无损，之后进入包装程序。这是一个容易得罪人的工作。有问题的产品挑出来了，前面做工的同事就得挨批，返工；没挑出来，就是自己工作失误。有时候小丽

发现了问题，会背着班长告知前面的同事返工，班长通常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即便这样，被要求返工的同事还是嫌麻烦。难以处理的人际关系，成为了之后小丽辞职的原因之一。而在进入新单位时，小丽向负责招聘的人员隐瞒了自己会做 QC 的信息。

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小丽有很多觉得幸福的事。有段时间不加班，每天早上 5 点多就下班了，小丽和几个同事考虑到这么早回去，肯定会吵到上白班的室友，便招呼有意愿一起去跑步的同事，每天下班后在工厂附近跑步，有时跑过一片香蕉地，就跑进去看看，每次跑步的路线不同，还能发现一些新事物。一直跑到 7 点左右才回宿舍，因为这时室友也差不多要起床上班了。有时休息，还会约大家一起爬爬山，日子过得挺开心。

小丽还参与了工厂组织去当地敬老院的义工活动，尽管老人们很少说普通话，交流起来是个困难，但还是觉得和老人相处很开心，并在和他们的交流中学到很多东西。

小丽说，新一年会感觉更幸福。增加幸福感的因素就是自己设定的期望达到了。不论做什么事，心态端正了就好。小丽有个愿望，就是能照张全家福，但这个愿望还没能够实现，一家子总是凑不齐，她期待的幸福就是一家人在一起。

新的一年，小丽设定了自己的努力方向：1、至少存到 1 万元。因为家里还没盖好房子，盖房子需要七、八万，每年自己都会存下 1 万元，现在已经存了 3 万了。2、继续自己的自考。在工业区没有学习的氛围，准备找培训自考的机构学习，同时工作时间的矛盾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3、可以学习电脑和英语。

## 带着女儿打工去

打工者：阿美  
打工所在地：北京

11 年前，阿美弃学外出务工去，为着家里的弟弟妹妹能有学上，她是老大，没有别的选择；11 年后的今天，阿美带着女儿在城里打工，为着女儿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不再吃自己吃过的苦。

1999 年春节过后，阿美跟随同村的姐妹阿欣南下惠州打工去。走的时候，阿美不住地掉眼泪，一次次回头想多看一眼家人。那时的阿美一心想赚点钱，她是老大，有责任帮衬家里，把正在读书的弟弟、妹妹供出来。一转眼 11 年过去。阿美依然在打工，依然辛苦，不同的是，她有了一个六岁的女儿陪在身边。这一年，为了女儿能接受更好的教育，阿美把女儿带到了打工的城市。

北京的 10 月底，天已经凉了。清晨 6 点，阿美轻手轻脚地起床，为女儿准备煮粥，炒个青菜。6 点半，女儿起床，洗漱完毕母女俩一起吃早饭，7 点钟准时出门上学去。

有时候女儿会念叨，“妈妈，同学喝奶、喝豆浆，我也想喝。”有时候阿美也给孩子买牛奶喝，但每天都喝奶，仍然是个奢望。

阿美是村子里比较早外出务工的年轻人。最早的时候出去打工就是想挣些钱，后来慢慢地觉得更有机会接触外边的世界，比较时尚。前几年，每年回来都会给老家亲友的孩子们带些糖果之类的，买条牛仔裤回家穿穿都让人羡慕，有老乡的声声赞许。而再后来这些孩子们慢慢地长大，她们也像

阿美一样读完初中甚至没有读完初中就跟随着村里早些出去的打工者一起外出务工，就这样慢慢地更换了一代人。

从1999年弃学外出务工至今已经有11个年头，在这11个年头里，阿美经历了人生中的酸甜苦辣，很艰难的时候会鼓足勇气跟家里人说说，发泄一下情绪，想家的时候会给家里打个电话，那些故事背后的不易和艰辛是难以想象的。当初弃学外出务工是因为家里还有弟弟妹妹需要上学，她是老大，没有别的选择，虽然自己的学习很不错。村里像她一样的“姐姐”或“哥哥”其实很多，他们自小就担当起家庭的重任，为了“不再担忧吃饭穿衣”，为了寻找属于他们的家庭幸福。在过去的11年中，阿美曾经两次受挫回乡在老家的小型冶炼厂从事应该由男人们完成的体力活，第一次是由于想去的那家工厂招工额满，第二次是因为感情受挫，与老公离婚只身一人带孩子回乡休整一段时间。

在这11年中，她每年定期向家里寄钱，供弟弟妹妹上学，补贴家用。在弟弟妹妹眼里，“俺姐是家里的顶梁柱，没有她我们根本不可能上高中、读大学。”而现在的弟弟妹妹都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他们在姐姐铺好的路上，继续努力着，因为大学毕业后的工作也是一样的艰难，当然这跟当初姐姐鼓足勇气放下上学机会外出务工还是不能比的。

阿美说，出去打工这么多年，还是觉得挺艰难的，不但工资低物价高，而且永远都是做普工，没有什么发展的前景，没有什么盼头，再就是这些年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了。在11年里，阿美去过3个不同的城市打过工，基本都在流水线上，她说现在自己也还是流水线上的普工，拼命地工作，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除了车间工作、食堂吃饭、宿舍睡觉以外，很少有其他时间做自己的事情，如果盼到有这个时间，也就是跟工友一起出去转转、买些东西、洗洗衣服之类。

除了工作，阿美也在打工期间认识了自己喜欢的人，谈婚论嫁并与他一起走进婚姻的殿堂，两个人也一起工作奋斗，过着让阿美幸福不已的生活。但是好景没长，夫妻两个人开始闹些矛盾，阿美说，丈夫有很多次动过手打过她，对她也不够信任。就这样，两个人本不牢固的情感根基动摇了，无奈之下她提出离婚并要求抚养孩子，后来经过一些周折最终她获得了孩子的抚养权，但是其实这对她而言是更大的压力，不仅是经济上的还有精神上的。值得阿美安慰的是孩子在阿美父母的抚养下已经慢慢长大并开始上学读书，而且孩子的学习成绩不错，这也是阿美觉得最幸福的事情，而阿美还是一人在外打拼。她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以后能有知识、有自己的本领，成为一个不怕困难的坚强的有责任心的人。

在新的一年里，阿美希望“能够找到真正可以与自己一起过日子的人。有个比较好的工作环境，自己的付出和回报能够相符，获得更高的收入，同时物价能降下来。再就是希望孩子能有更好的上学机会，长大能过上更幸福的生活。”

## 幸福源自家庭

打工者：小杨

打工所在地：珠三角工业区

外出打工13年，南下北上，家庭的幸福始终是支持小杨辛苦工作的最大动力。每年春节，不管多忙回家的车票多难买，小杨也要回家团聚去，“这是一年最大的幸福”。

小杨的老家在河南十里井村八里营。1998年，小杨16岁，第一次离家，坐着火车，和村里一群年轻后生一起出去打工，见世面去。第一份工是在河北保定的造纸厂，一个月挣400块。那一年年底，小杨给家里寄回了2000块钱。

1999年，小杨外出打工后第一次回家过春节，爹娘仔细看着，不住地说“瘦了，瘦了”，看着爹娘心疼的眼神，小杨心理觉得幸福知足。

在纸厂工作了三年后，小杨南下，到广东东莞、澄海，做过手机外套，做过注塑，进过养鸡场，还被传销骗去过东北。最辛苦的是在北京做建筑工，刷外墙。“尤其是夏天，刷墙是越往上爬就越热，那温度跟地面相差好多！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反反复复，一天下来，上面都是一层盐。”

工作辛苦，支撑他的，是家乡的父母。小杨说，父母为他奋斗了一生。“苦，一生就一个字，苦！特别的节俭，从来不会谈自己的感情，但能感受到他们一生的爱，爱人！”不管工作多忙，回家的车票多难买，几乎年年春节，小杨都要回家看看，尽管来去匆匆，也觉得特别幸福。

2009年，对小杨来说，是格外幸福的一年。小杨的妻子怀孕了。让小杨难忘的是，有天他带着妻子去河边公园看牡丹，十几里地都是牡丹花，那个美啊！另外一件幸福的事儿是，折磨小杨母亲20多年的胆结石治好了，小杨专门带她去了外地医院，7天花了一万多，然后小杨亲自在家照看着母亲，直至痊愈，把病彻底治好了。

2010年春节回家过年，孩子刚会跑，一会儿跑过来叫“爸”，一会儿跑过来叫“妈”，小杨心理充满幸福。

做了父亲，小杨的担子也更重了，而收入方面却依然不是很理想。小杨理想的收入是“除去日常的开销后，每个月能剩余1700到1800元”。现在，小杨每个月的纯收入不过1300多，为了多挣些钱，小杨准备离开工厂去做建筑，积攒些钱，再回老家，搞搞养殖。这样，和孩子、和母亲可以生活在一起。“一个人幸福不幸福，是来自家庭的，来自和家人在一块儿的那种气氛，那种放松、愉快的心情。”小杨说。

## 打工第一年

打工者：小柯

打工所在地：合肥

这是小柯职校毕业的第一年。2010年6月，小柯成为了某知名国企分公司的一员。

今年这个春节，对小柯来说是意义非凡的，这是他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年，毕业后外出务工的第一年。

在过去的一年中，小柯很庆幸自己从职业技术学校一毕业就去了某电子集团合肥分公司，该公司主要负责生产彩电塑料外壳。小柯在职业技术学校学习的是数控，现在的主要工作是维修工厂的生产设备，虽然技术含量不是很高，但是小柯觉得活得还是比较累。他觉得一年当中自己最痛苦的时候就是工作时间不够稳定，有时候上班的时间比较长，尤其是机器需要维修保养的时候。他说，最累的时候不是工厂活最多、生产最忙的时候，反而是生产较为空闲的时候，因为那些时候很多设

备是需要进行保养的，也就是他们维修人员最忙碌的时候。同时令自己比较苦恼的是很多时候加班是没有加班费的，就此事他还专门向懂点法律的亲友进行过咨询并尝试去找公司进行了商谈，但是公司还是没能如其所愿支付他的加班费，理由是“公司历来就是这样的，如果真是不想干，那就别干了，现在不缺人。”后来小柯再三考虑还是决定继续在这家公司工作，因为“刚出来工作，能找到工作就很不容易了，现在辛苦点没啥，希望下一份工作可以更好些，自己辛苦的劳动付出能够跟所得相符合。”

现在的小柯开始思考寻找一份新工作，他说觉得做维修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一方面收入比较有限，还比较累；另一方面自己虽然工作的时间不久但是还是积累了不少经验的，希望可以找到一份更适合自己的工作。其中小柯特别地提到，希望自己能够实现人生的价值，为社会多做贡献，但是具体要做什么他说需要自己一步步地来，也还有些迷茫。

小柯说，2010年从职业学校到开始打工挣钱，自己的职业角色还没有转变过来，“有时候工作中比较爱使性子，其实有时候可以看的更开一点，有些东西凭自己改变不了什么。”但是他说自己对社会也有了更多的认识，这些认识远远超过学校里学的东西，比如怎么样可以更好地跟领导同事处理好关系、怎么样看待社会上的甚至就在自己身边的那些不太公平的事情等等。

说起过去一年中最幸福的事情，小柯说，“我有好几个比较幸福的事情，第一就是过年回来跟家人团聚在一起，虽然一年中也就这么几天；第二就是自己有了一份工作，能够自己挣钱，算是在经济上独立了，还能给家里寄点钱；第三个就是刚工作开始自己独立地完成了一件重要工作，用一天一夜的时间修好了一个大设备，保证了正常生产，那也是很幸福的，很有成就感。”

对来年的幸福期待，他说：“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再上一个台阶，收入再高点，能够在新年突破自己。同时找到适合自己的另一半，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这也是他新一年的目标和方向。

## 数据篇

### 概述

本次调查问卷共设计50个问题，涵盖了农民工基本状况、幸福感知状况、生活幸福感自我评价和工作幸福感自我评价，以及对未来幸福的期待等五大主题内容。本次调查共计发放调查问卷428份，回收有效问卷403份，有效回收率为94.16%。问卷发放区域主要集中在劳务输出密集的地区，如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河北、山西，以及云南、内蒙古等地区，共计12个省；涉及三个农民工劳务输入的重要城市群：珠江三角洲的深圳、广州、汕头、珠海等，长江三角洲的南京、苏州、徐州等；京津冀地区的北京、天津、河北等。作为一家兼具支持性与服务性的社会工作专业机构，北京协作友希望此次调查可以进一步了解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以及对幸福生活的期待，为构建和谐社会，幸福家园贡献一己之力。

## 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本次调查中，男性农民工 232 人，占 57.6%，女性农民工 165 人，占 40.9%；已婚人群占 46.9%。调查对象绝大多数是年轻人，18-30 岁间的调查对象占 60.8%，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军。

调查对象中，外出打工时间 5 年以内的占 58.8%，5-10 年的占 22.8%，外出打工 10 年以上的农民工达到 15.9%。在 2004 年协作者《京粤青三地农民工生存与发展基本状况调查》（以下简称“农民工生存调查”，《流动与融合》，团结出版社，2005 年 8 月出版，李真主编）中，农民工打工时间达到 5 年以上的比例为 22.5%；在 2008 年协作者《农民工眼中的金融危机调查》（以下简称“金融危机调查”，《经济中国》，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年 8 月出版，刘永信主编）中，时间达 5 年以上的为 29.7%，本次调查中这一数据增长到 38.7%，由此可以看出，农民工持续稳定在外务工比例正在稳步递增。

本次调查显示，农民工普遍对未来充满信心，当下则幸福感平平。51.4%的农民工认为当下的幸福程度一般，有 37.0%的农民工认为现在的生活与理想中的生活不接近，有 56.6%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可以自主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

而同时，47.9%的农民工认为现在的幸福程度比五年前好，有 78.1%的农民工认为 5 年后的幸福程度将会比现在好；农民工对未来自我发展有信心的占 69.2%，农民工对未来社会发展有信心的占 63.3%。

农民工普遍认为当下的幸福感较之从前有了很大提升，但并未提升到理想中的幸福状态。对未来充满期待，当下则感觉“凑合”、“就那么回事儿”，一些人甚至直言“不幸福”。

在与问卷调查同时进行的访谈中，“不幸福”的感觉呈现出年轻化趋势，尤其在刚刚开始打工生活的年轻农民工间，很多直言当下没有幸福感，“顶多有时候觉得高兴，但‘高兴’是一时的感觉，算不上幸福。”农民工对于幸福的期待正在提高，其需求愈发多元化，并非局限于物质层面，更希望能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生活、职业却无法满足其发展的需要，不能分享社会优势资源，缺乏上升空间，这一切，都使得农民工改变自身生活的努力越发艰难，使其难以对自身的生活产生幸福感。

23 岁的流水线工人小温说：“从工作、家庭、情感这几块儿看，我觉得现在的我算不上幸福。但我会努力，让自己三五年后幸福起来。”小温的同事小明也说道，“目

前，主要是感情、家庭方面的因素会影响到自己的幸福感。预计要改变这种状态，还要再奋斗三到五年。”

“三五年后”成为了农民工理想中模糊而幸福的未来。访谈中，农民工普遍呈现出对自己未来发展的茫然。这种乐观与茫然的情绪交织下，潜藏着农民工对自身职业规划、人生规划的缺失。而这，需要政府部门、企业、相关社会组织共同给予引导与支持。

农民工怎样定义幸福？什么是农民工眼中的幸福？以下数据或可说明问题。

## 家庭，幸福的第一要素

调查显示，农民工认为与幸福有关的主要因素中，家庭以绝对优势领先，占 78.2%；情感、事业位居二、三位，比例分别为 49.4%、41.4%；收入因素也是决定农民工幸福的关键因素，占 40.2%。其他影响幸福感的因素有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理解、沟通，以及社会地位得到满足等（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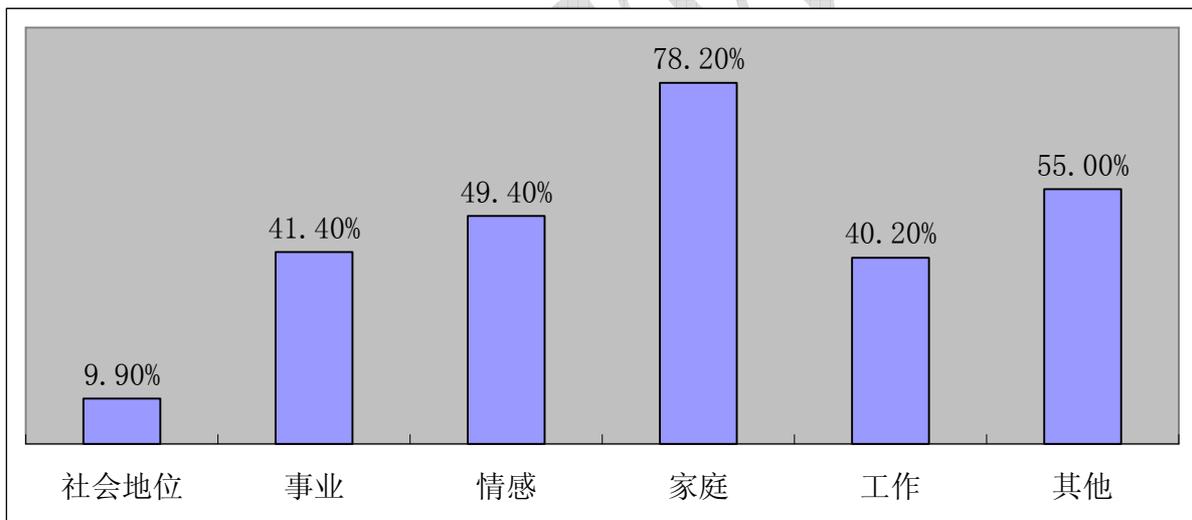


图 1 农民工认为与幸福有关的主要因素排行

改革开放 30 余年，中国农民的经济状况大幅度提高，挣钱求生存已经不是农民外出打工的第一动因。生存的压力消除，使农民工群体对幸福的多元化期待展现出来。

什么样的人最幸福？接受调查的农民工普遍认为“自己和家人身体健康”、“拥有一个和睦家庭”、“事业上有成就感”的人最幸福，比例分别为 52.4%、43.7%、34.5%（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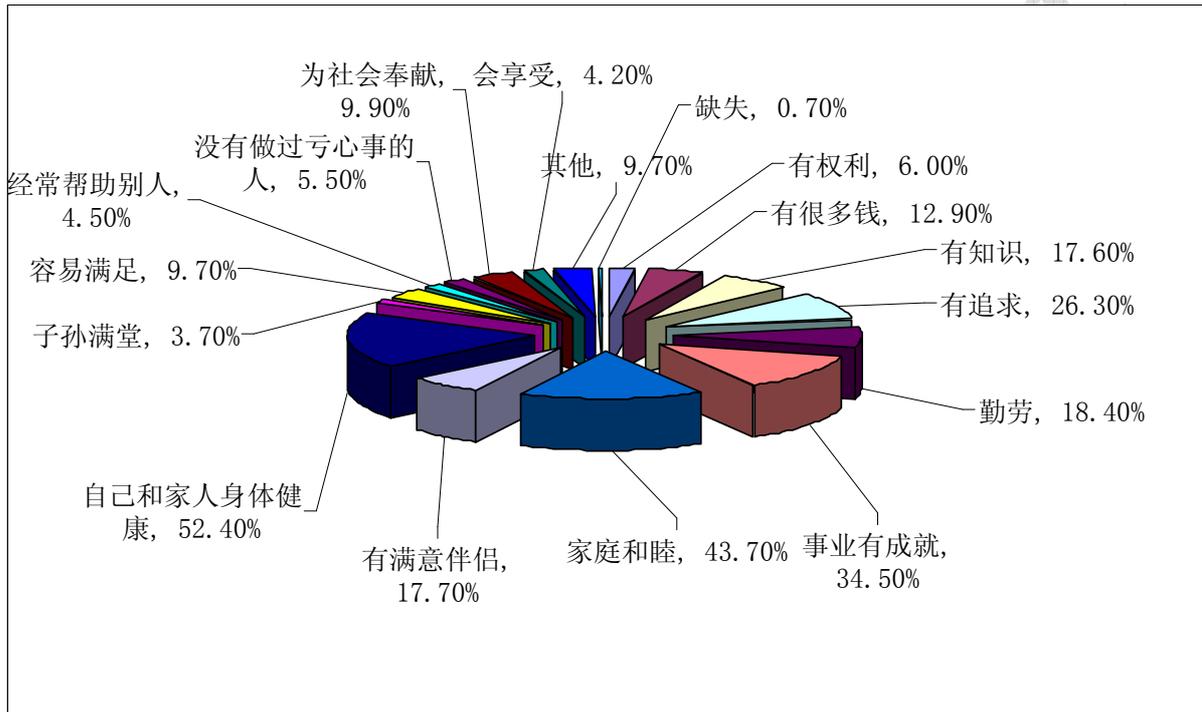


图 2 农民工眼中“什么样人最幸福”（多项选择题）

农民工认为可以增加自己幸福感的前三位主要因素分别为：家人能在一起或更多团聚机会，占 56.3%；满意的收入，占 48.9%；健康的身心，占 40.9%（见图 3）。同时，调查显示，农民工最看重的生活环境是家庭（占 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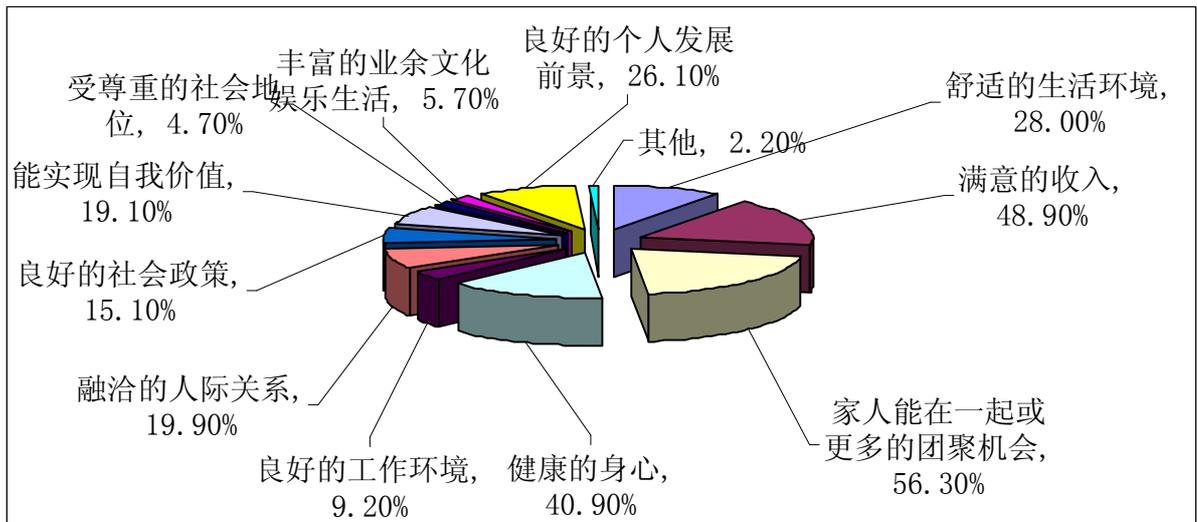


图3 农民工眼中可以增加自己幸福感的因素（多项选择题）

综合以上数据可看出，农民工幸福需求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家庭因素以绝对优势领先，经济因素退居其后。不仅在老一代农民工中，在被普遍认为“更自我”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对家庭的重视也胜于收入因素。家庭，依然是农民工在外生活、工作的最大支持。

在与问卷调查同时进行的访谈中，北京的打工者、23岁的小浩直接把幸福定义为“有一个好的工作，有一个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42岁的打工者老侯，通过自己十几年的努力，终于把妻子、孩子接到了北京，得享天伦之乐。老侯总结出：“幸福就是儿女孝顺，生活美满，我和我的妻子在家里为他们做饭，做家务，等着他们回来一家人吃饭。”这种传统的家庭观念，以家庭为目标的奋斗，使得以家庭为单位的迁徙，逐渐取代个人的单打独斗，成为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主要形式。

同时调查显示，这些农民工认为与幸福相关的重要因素，在现实生活中均未得到很好的满足，从而成为了降低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对于降低农民工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收入低（45.2%）、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少（42.4%）、个人发展前景黯淡（27.5%）；身心健康状况不好、不能实现自我价值、居住条件差等均会使会农民工的幸福感大打折扣（见图4）。

在与问卷调查同时进行的访谈中发现，很多农民工迫于生计，不得不远离亲人。而一旦其经济上获得改善，他们会做出种种努力，与家人团聚。访谈中，在珠三角工业区打工的小杨正筹划着离开流水线去做建筑工，以便多攒些钱，之后就试试回河南老家去搞养殖，“父亲去世了，想和家人在一起时间长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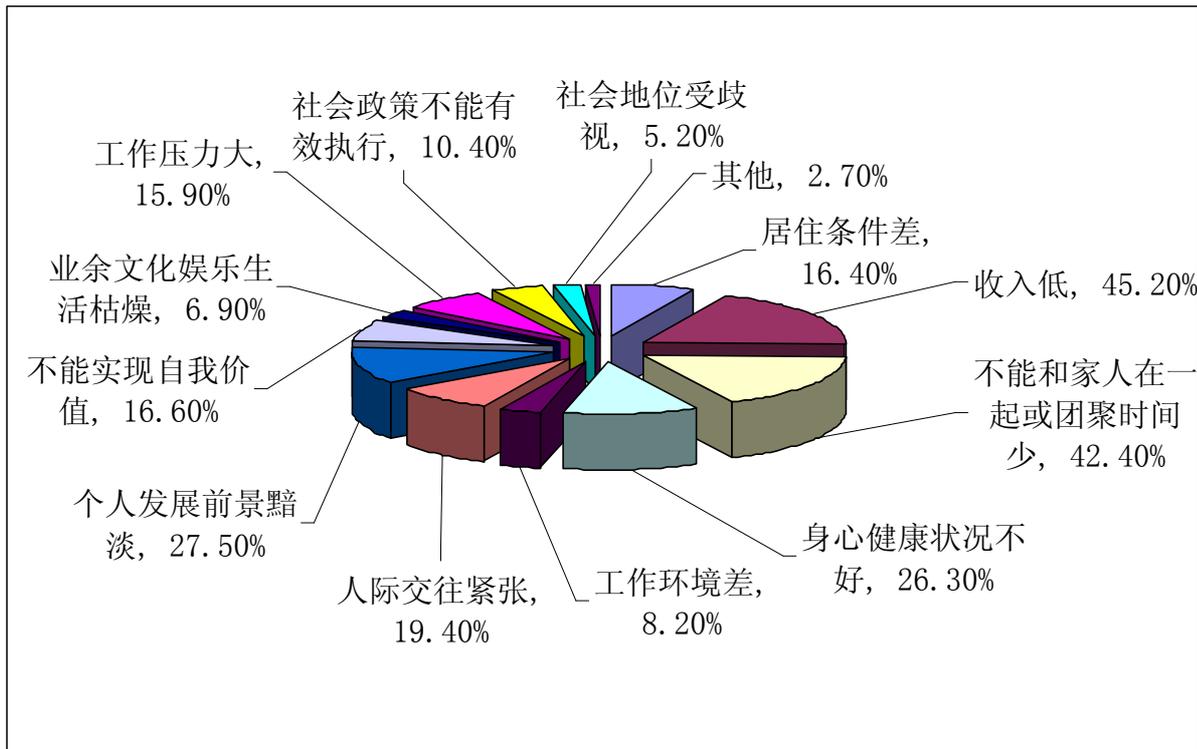


图 4 降低农民工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多项选择题）

### 揣着“高学历”，走上父辈老路

本次调查中，农民工文化程度主要以初中和高中为主，分别占调查总人数的 43.2% 和 37.7%，大专及本科文化程度占到 8.2%，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到 8.7%。对比北京协作者 2004 年进行的“农民工生存调查”相关数据，当时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在初中的仅占 21.3%，本次调查中农民工文化水平在初中以上者达到 89.1%，有大幅度提高。而相比较农村的整体学历教育水平，他们显然是乡村社会中高学历的精英群体。

尽管学历大幅提高，但受调查者所从事的职业依然集中于生产流水线工作，占 32%；技术工人，占 11.7%；建筑工人、销售人员、个体经营、技术工人、装修行业、服务员等（见图 5），与老一代农民工并无明显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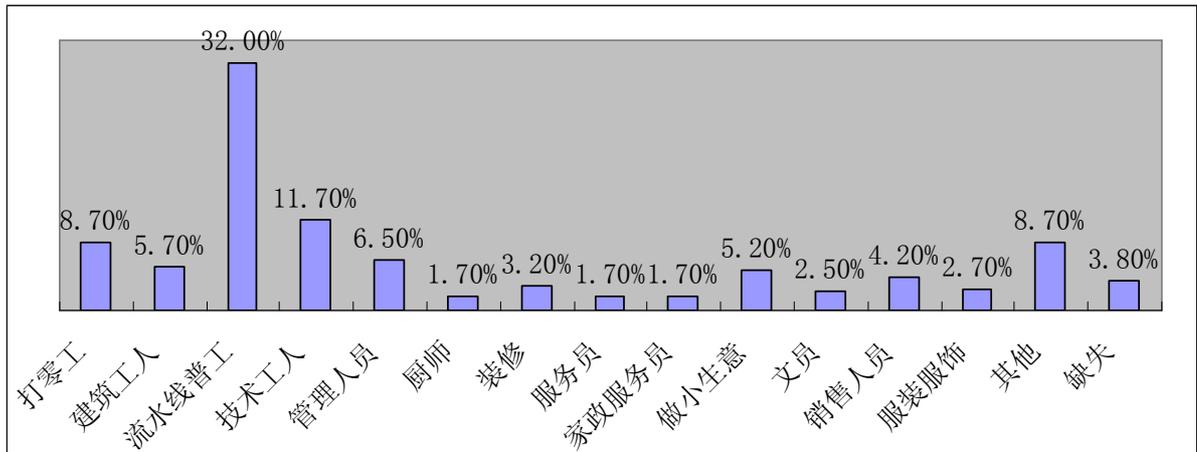


图 5 现阶段农民工从业比例分布

他们对此是否满意呢？本次调查中，农民工对目前工作状况满意程度一般的占 53.6%，认为比较满意或者非常满意的占 24.8%，认为比较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占 20.4%。有 41.9%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对于现在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满意程度一般，认为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的占 19.6%，比较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的占 37.4%。在深入访谈中，被调查者进一步澄清了这种“一般”的感觉为“凑合”、“就那么回事”、“马马虎虎”。

可见，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已无法满足农民工的职业期待。本次调查中，调查对象中 60.8%为 18 至 30 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些年轻人从小在父辈师长“知识改变命运”的期盼中成长，接受了系统的学校教育、专业技能教育甚至高等教育，对自己的未来抱有更高期许，而面临的依然是和父辈相同的职业之路，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依然是其就业的第一选择。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局面？如果接受教育都不能改变命运，农民工子女的上升空间被封堵，他们将如何找到突破口以改变自身命运？

我们必须反究，农民工、农民工子女所接受的是何种教育。

受户籍制度所限，学龄儿童必须于户籍所在地就读，农民工子女在义务教育期间面临以下三种选择：在老家的公办学校就读、在父母打工所在地的打工子弟小学就读，或在父母打工城市的公办学校就读。毫无疑问，城市的公办学校教学质量最高，而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对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困难重重，需办理“五证”甚至“七证”，有些还需缴纳高额的赞助费。即便顺利入学，小学、中学教育结束后，高考成为了最大的挑战，

考生需返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家长们不禁疑问，“孩子在城里上学，但考高中还得回老家考去，教材都不一样，怎么考？”

本次调查中有子女的农民工占 43.9%，其中认为自己的子女受教育状况很好或者非常好的占 45.4%，认为子女受教育状况一般的占 43.9%，认为子女受教育状况很不好或非常不好的占 9.7%。

温家宝总理曾说：“收入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时，但是教育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生。”如果社会优质资源永远不能惠及弱势群体，竞争的环境先天性公平缺失，农民工子弟改变命运之路将充满艰难。

这些年轻的打工者直接从校园走上工作岗位，由于之前并无充足的生产劳动经验，在耐受性上已经不如老一辈农民工。同时，流水线、基层技术工人等工种，发展空间狭小，技术含量低，无法满足其自我发展的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中面临的失落和挫败感更强。

在访谈中，珠三角年轻的流水线工人小海如此评价自己的现状：“做的事情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发展的空间又小，没有人际关系……在事业上觉得自己现在是一无所有。”调查者发现，“一无所有”、“一无是处”的茫然感在年轻打工者中弥漫。他们渴望改变，愿意付出努力以谋求个人发展。在问及选择工作的标准时，有 54.1%的农民工将**“未来长远发展”放在第一位**，第二位的是“积累自己创业的原始资本和技能”，占 46.9%；选择赚钱多作为标准的农民工占 41.9%，可以掌握一种谋生技能的占 37.7%，工作经验的积累占 33.0%（见图 6）。尽管超过半数的受访对象将“未来长远发展”视为选择工作的第一位，对于其自身的职业发展却缺乏明确规划，大多数人模糊地将奋斗的目标定位为自己创业、当老板，而这个模糊的奋斗目标，正反应出农民工出路的狭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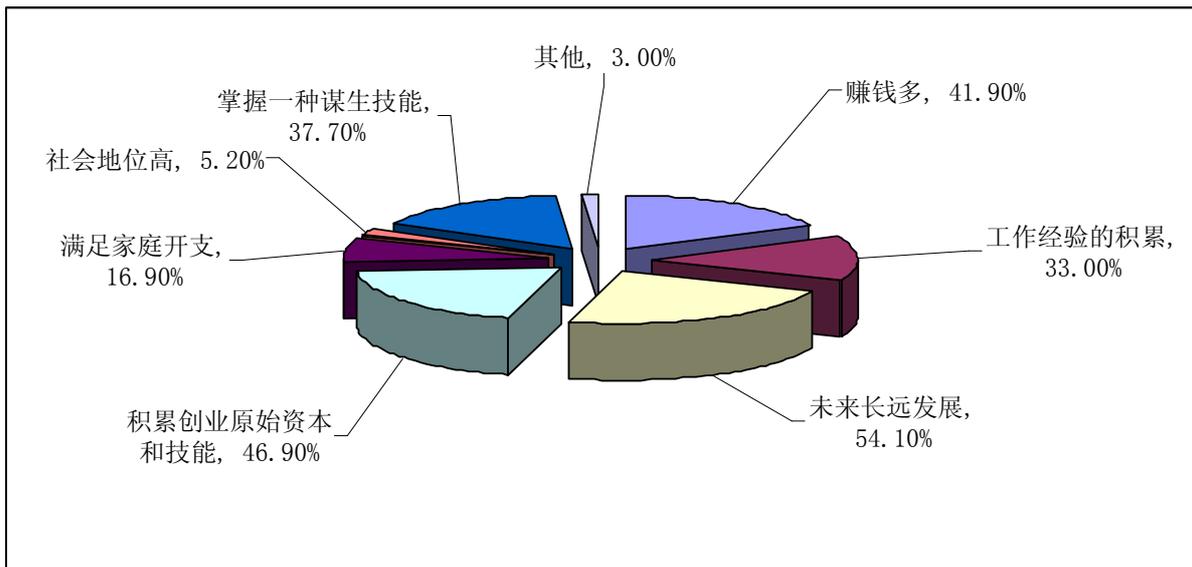


图 6 农民工对于工作选择的标准 (多项选择题)

职业缺乏上升空间，收入低廉，使相当一部分农民工难以对自身职业产生认同感，更难以从中获得成就感。调查中 53.1% 的农民工认为社会上的人对自己的尊重态度一般，认为社会上的人对自己比较尊重或者非常尊重的农民工有 41.7%，有 5% 的农民工认为自己不受到尊重。同时，有 56.5% 的农民工认同“我觉得我对社会有所贡献”这个看法，有 35.5% 的打工者认为自己对于社会的贡献程度一般，6.4% 不认为自己对社会有所贡献。

在现代社会，经济改进无法替代公民的尊严。自政府提出要让人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后，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的尊严在内的各种“尊严”议案被提上议程。而“尊严”无法通过喊口号来赋予，公民的尊严根植于其基本权利之上。让农民工生活得有尊严，必须保障其权利，在公正公平的社会环境中生活发展的权利。

### 微薄的薪水，教人如何说满意

此次调查中，农民工月工资在 1001 至 1500 元的占 18.4%，在 1501 至 2000 元的占 30.5%，在 2001 至 3000 元的占 26.6%。约有 10% 的人收入不足 1000 元，有 10.9% 的农民工收入在 3001 元以上。

2004 年北京协作者“农民工生存调查”，当时的农民工收入主要集中在 500 元至 800 元，占 58.1%；2008 年“金融危机调查”中，农民工收入集中在 1000 元至 1500 元，

占在 37.4%；月收入在 1500 至 2000 元的占 22%；月收入在 2000 元以上的占 22.3%。相对比不难看到，2004 至 2008 年，农民工收入有明显提升，而 2008 至 2011 年，农民工收入增长缓慢。

对于工资现状，45.9%的农民工**认为收入状况一般**，30.3%的农民工认为比较不满意，非常不满意的占 8.7%，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占 14.1%。38.2%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收入与付出相符程度一般**，认为比较不相符的占 33.0%，认为比较相符的占 19.9%，认为非常不相符的占 7.2%，认为非常相符的占 1.2%。

2004 年 8 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表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称：“珠三角”地区 12 年来月工资只提高了 68 元。

2010 年，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发布《外来农民工调查》显示，2008 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出口工厂的工人平均年收入仅是这两个地区城镇在岗职工年均工资的 37.82%。

如此低廉的收入，还是长期加班换来的，使农民工对自身收入难以满意。

一边是缓慢增长的收入，另一边却是快速飙升的物价。以 2010 为例，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一年上涨 3.3%，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7.2%（数据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低收入使农民工的生活水平与社会其他阶层越拉越大。

调查显示，有 42.4%的农民工对目前的**物价状况**比较不满意，24.6%的农民工非常不满意；认为物价消费状况一般的占 28.3%；比较满意的占 4.0%；非常满意的仅占 0.2%。有 49.4%的农民工对自己现在的**物质生活满意度一般**，29.5%的农民工对自己的物质生活非常不满意；19.1%的农民工对自己的物质生活比较满意或者非常满意。

在农民工密集地区，生活成本往往高于一般城市。同时，由于公共服务缺失，农民工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个人开销较高。低廉的收入通常仅能满足一般生活所需，难以进一步满足其自身发展的需求。这不仅会影响生活幸福感，更有可能引发一系列情绪问题。

### 情绪问题，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2010 年，富士康“12 连跳”悲剧引起社会震动。自杀，是情绪问题长久积累下的极端反应。本次调查中的数据，更为清晰地呈现出农民工的情绪状况。

本次调查的农民工中，39.7%农民工认为自己在过去一年中，经常处于积极的情绪状态，30.3%认为自己有时处于比较积极的状态，21.3%认为自己偶尔或者从不处于积极的状态（见图7），仅有7.9%的打工者认为自己总是处于积极情绪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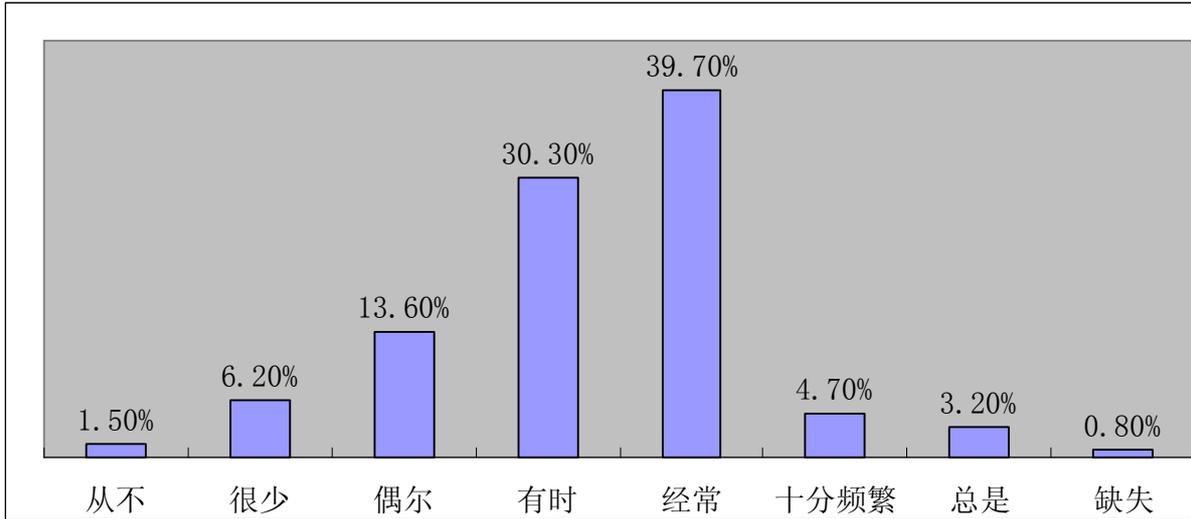


图7 农民工处于积极情绪状态的频率

在过去一年中，偶尔或者很少处于消极状态的农工占46.1%，认为自己有时处于消极状态的占33.0%，有15.1%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经常处于消极的情绪状态，如紧张、焦虑、烦躁等（见图8）。约有0.7%的打工者从不处于消极状态，1.0%的打工者总是处于紧张、焦虑、烦躁等消极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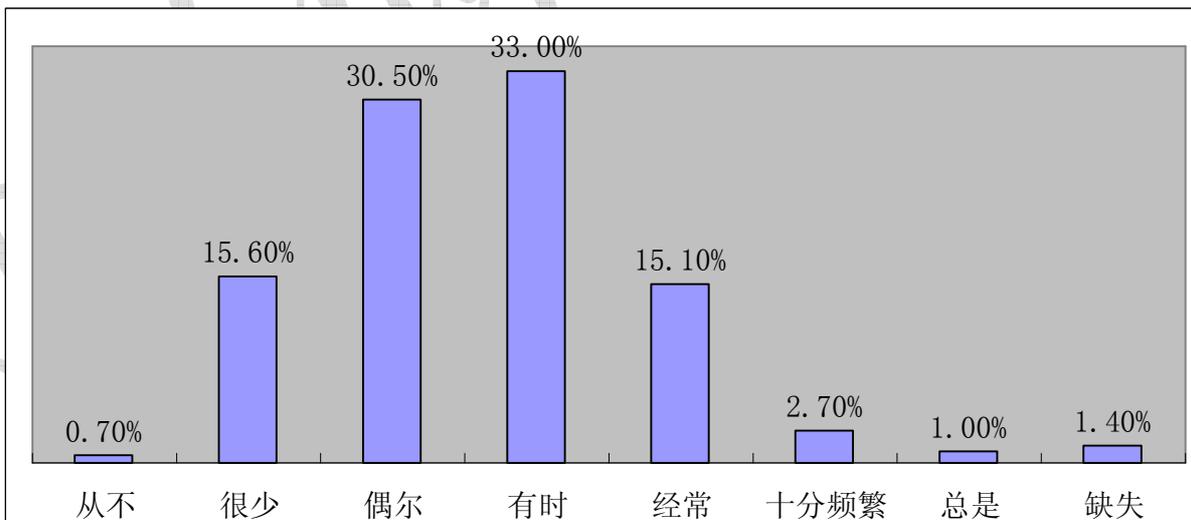


图8 农民工处于消极状态的频率

同时，在本次调查中有 52.4%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身心健康状况很好**，10.2%的农民工认为非常好；29.5%的农民工认为一般；而有 6.7%的农民工认为很不好或者非常不好。

调查显示，认为自己“从不”处于积极状态、“总是”处于消极状态且自己的打工者大多处于 18 至 30 年龄段，主要从事企业流水线普工职业，工资水平为 1501 至 2000 元整。

在打工所在地，尤其是相对独立隔绝的工业区内，个体生命被纳入工厂整体的生产流程中。农民工原有的社会联系被切断，新的社会联系又难以建立，没有抒发情绪的适宜途径；同时，工作缺乏发展机会与足够的上升空间，生活环境中缺乏相应的心理支持，这些都导致农民工产生情绪问题。

本次调查中 53.3%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打工所在地人情味平平淡淡**没有什么感觉，36.5%的农民工认为人情味浓厚，很好，6.7%的农民工认为人情冷淡。“打工的生活是不幸的，有的时候感到很孤单很寂寞，想找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珠三角工业区的打工者说。

48.9%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人际关系很好**或者非常好，48.1%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人际关系一般**；认为很不好的占到 2.5%。认为自己**与老板相处情况一般**的占 52.4%，比较满意的占 26.6%，比较不满意的占 7.2%，非常满意的占 6%，认为非常不满意的占 3.2%；认为自己**与同事相处状况比较满意**的占 50.1%，一般的占 24.8%，认为非常满意的占 18.6%，比较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占 3%；有 74.4%的农民工认为自己**与家人的关系非常亲密**，认为与家人关系一般的占到 21.6%，认为疏远或者非常疏远的占 2.7%。

由此可见，农民工最稳固的情感链条，主要存在于家庭成员之间，而非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关系则稍显弱于家人。对打工所在地，则缺乏归属感。

半数以上的受调查农民工认为自己与同事相处较为融洽，说明同伴间的相互支持依然是农民工的主要慰藉；同时，仅有 32.6%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和老板的相处状况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农民工群体在工作中，得到的来自上层领导者、企业方面的关注与支持不足。流水线上工作的年轻打工者则直接表示，“打工过程中最痛苦的就是上班的时候天天被老大骂。”

农民工离乡背井，进入崭新的工作环境，人际关系几乎为零。主要依托于家庭、同乡间的彼此支持。而用人单位，尤其密集型产业，在招聘时最需要的就是没有任何人际关系的人，这样的人稳定性好，易于管理。有经验的打工者会嘱咐新来的同乡，“应聘的时候，如果是一个老家的，认识也要装不认识，不然进不去厂。”把人打散成最脆弱的个体，以适应机械化的管理。

珠海某工业区的打工者小莉说：“刚进厂后的几个月，身边一个人都不认识，整天就是摁手机。自己也常不在宿舍，和宿舍的人少说话。七、八个人的宿舍，因为调动的原由，宿舍里的人是只有3个人是相互认识的，其他人都是互不交流。”

这种孤独感并非只出现在沿海十数万人的大型工业区，在内陆相对小型的工业区、开发区中，打工者们也体会着这种孤独。

不仅是孤独，身边的不安全因素更让人觉得无助。珠海工业区打工的小杨刚应聘了一份工作，满怀欣喜的结了第一个月的工资，打算取出来寄回家孝敬孝敬父母，可不想，只在食堂吃了个饭，那一千多块钱就不翼而飞了。丢钱的经历，很多打工者都曾经经历过，“很普遍，自己没丢过身边的人也丢过。值钱的东西不会放在宿舍，随身带着也要特别小心。”对于同住一室的室友也不敢轻信，“和室友虽然有的相识了半年，但彼此之间还是有种戒备心，也不会把心里的一些事说出来。”机械化高强度运转的工业区中，单一的生活，快速流动的人群，无一不强化着个体间的戒备，使得农民工群体难以形成彼此间的有效支持。

缺乏支持带来强烈的无助感，同时，在这样的环境中，来自他人的认可，往往可以带给农民工极大的心理支持。在餐馆工作的小侯清楚地记得“今年快过年的时候，一位住宿的客人给我们全体员工发了旺旺大礼包，特别幸福，不是因为东西的多少，而是因为他对我们工作的认可。”

### “一般化”的生活，被公共服务遗忘的角落

本次调查中，关于农民工对自己生活状况的评价，由一连串的“一般”构成（见图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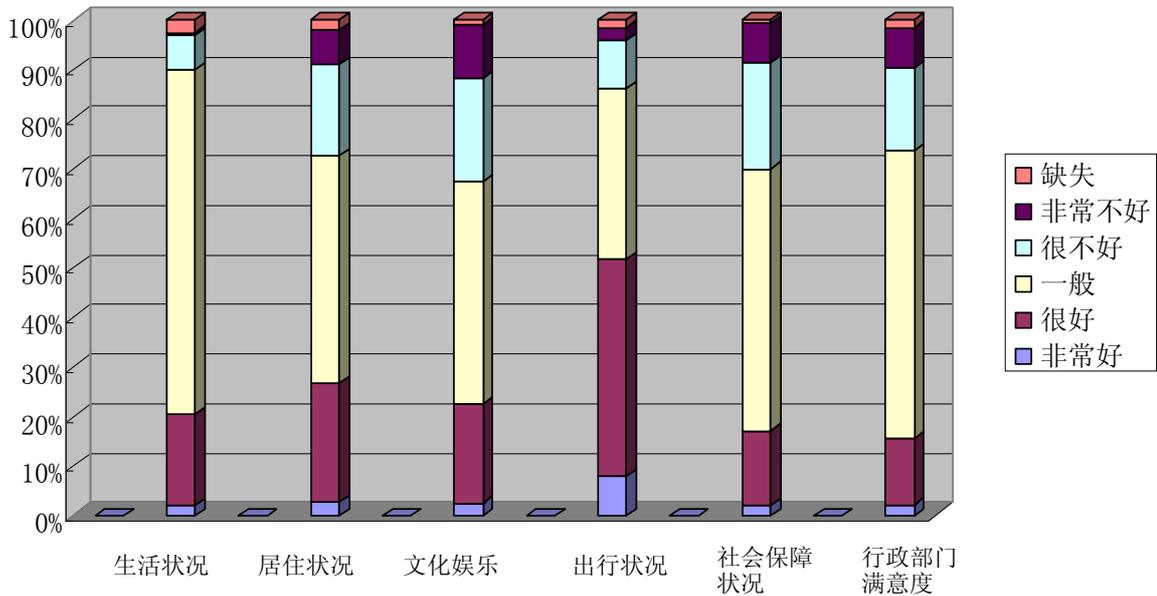


图 9 农民工生活幸福感自我评价

调查显示，有 69.7% 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生活状况一般，7.4% 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生活状况很不好或者非常不好；只有 20.4% 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生活状况很好或者非常好。

57.1% 的农民工认为打工所在地社区居住环境一般，45.7% 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打工所在地的居住状况一般，44.9% 的农民工认为打工所在地文化娱乐生活一般。

#### “一般”化的生活背后，是公共服务的缺失。

农民工主要居住于工业区或城市的城中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农民工群体不断向未开发的城市边缘迁移，居住环境差，配套设施不足。且因收入所限，通常整个家庭集中居住于一个狭小的房间，居住状况较差。对于工业区的打工者而言，集体宿舍高密度的居住环境，私人空间缺失。同时，农民工聚居区普遍缺乏公共文化场所，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场所未能覆盖农民工居住区，商业化娱乐场所如网吧、露天台球桌、卡拉 OK、溜冰场等，难以满足农民工的文化需求。

在本次调查中，关于生活幸福感调查部分，唯一被多数农民工认为“较满意”或“非常满意”的选项是出行。41.8% 的农民工认为出行比较方便或者非常方便有 34.2% 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出行方便程度一般，有 12.4% 的农民工认为出行不方便。一方面，政府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公交出行便利度提升，并有效降低了出行成本；同时，对于工业区的

农民工，平日里的出行，仅限于从宿舍到厂区，由于居住、工作所在地十分接近，出行上感觉较为便利。这种出行便利的感觉，侧面反映了农民工的活动范围狭小，出行需求单一。

52.9%的农民工对自己的社会保障程度满意程度一般，比较不满意的占21.3%，非常不满意的占8.2%，比较满意的占15.1%，非常满意的仅占2.0%。尽管《劳动法》明确规定，企业要为农民工缴纳保险，但据北京协作作者2004年进行的《农民工生存调查》显示单位给农民工“什么都没上”的占43.7%，只上“养老保险”的占17.1%，只上了“医疗保险”的占10.5%，只上过“工伤保险”的占12.4%，上“生育保险”的占0.4%，“不知道单位给上没上的”占14.8%。

同时，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一定弊端，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中，除工伤保险外，其余难以让农民工直接受益。呼吁多年的养老保险跨省转移，尚没有完全实现，难以为处于流动状态农民工提供切实服务。

本次调查显示，有58.1%的农民工对打工所在地行政部门满意程度一般，比较满意的占13.4%，非常满意的占2.2%，比较不满意的占16.6%，非常不满意的占8.2%。

农民工为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在很多地区却不能享有当地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只付出不分红，公共服务的缺失导致了这种“不满”情绪的产生。以和社区居民生活关联较为密切的社区居委会的服务为例，相当一部分居委会只向本地户籍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对于非本地户籍的农民工，则仅提供监督管理性质的“服务”，如计划生育、安保等。农民工老张说：“居委会啊，就是过年过节赶上大活动时嘱咐嘱咐防火，别出事儿。”而与农民工群体生活密切相关的教育、住房、医疗卫生等，则需农民工以其微薄的收入自行支付。农民工付出了劳动，同为纳税人，却不能享受服务，只能接受管理，使其难以对行政部门满意。

## 建议篇

在调查与访谈的基础上，我们结合多年服务农民工的实践经验，提出如下感受与建议：

**1、感受：农民工渴望与家人在一起。**农民工认为与幸福有关的主要因素中，家庭以绝对优势领先，经济因素退居其后。以家庭为核心的打工奋斗目标，使得以家庭为单位的务工迁徙，逐渐取代个人的单打独斗，成为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主要形式。不仅在老

一代农民工中，在被普遍认为“更自我”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对家庭的重视也胜于收入因素。“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少”，则成为降低农民工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建议：**转变以往单纯由经济角度考量农民工的传统意识，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农民工“一切为了钱”的狭隘看法，消除“农民工愿意加班”的错误认识，正视其家庭生活需求；通过适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减少农民工被动加班的压力；完善落实农民工廉租房、保障房政策，让具备条件的农民工逐步安家落户，不仅有利于提升农民工的幸福感，而且可以降低企业因工人被动流动而产生的额外人力资源成本，增强当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2、感受：农民工渴望归属感。**农民工持续稳定在外务工比例正在稳步递增，他们渴望能融入打工所在地生活。而农民工最稳固的情感链条，主要存在于家庭成员之间，对打工所在地，则缺乏归属感。

**建议：**用工单位、工业区及社区服务部门需要转变对农民工“劳动力”的单一看法，正视其“社区人”的角色；加强社区公众教育，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农民工与打工所在地居民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活动，促进城乡居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建立包容接纳的社区文化。

**3、感受：农民工渴望社会保障。**大部分农民工不满意自己的收入。在农民工相对集中的地区，尤其是工业区，生活支出成本往往高于一般城市。同时，由于公共服务缺失，农民工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个人开销较高。农民工低廉的收入通常仅能满足一般生活所需，难以进一步满足其提高家庭生活质量，及其自身发展的基本需求。这不仅会影响生活幸福感，更有可能引发一系列情绪问题。而金融危机以来，农民工收入增长减缓，失业压力加大，缺乏社会保障，使其缺乏生活安全感。

**建议：**加强对农民工聚集的工业区、城乡结合部社区的卫生、教育、交通、邮政等公共投入，降低农民工生活支出成本；提高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加快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实现养老保险的跨地域转移；建立适用于农民工的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大病救助等社会保障体系。

**4、感受：农民工渴望多元化的职业选择。** 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有较大幅度提高，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接受了系统的学校教育、专业技能教育甚至高等教育，对自己的职业抱有更高期许。而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依然是其就业的主要选择，与老一代农民工并无明显差别。农民工难以对自身职业产生认同感，更难以从中获得成就感。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中面临的失落和挫败感更强。

**建议：**相比较农村的整体学历教育水平，新生代农民工显然是乡村社会中高学历的精英群体。需要社会转变以往对农民工“廉价劳动力”、“低素质”的偏见，正视农民工群体的能力与价值，完善法律政策，落实、保护农民工在非体力劳动领域的平等就业权；加强农民工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尤其是应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探索多样性的专业设置，增强农民工的职业选择空间。

**5、感受：农民工渴望心理疏导与支持。** 农民工经常处于紧张、焦虑、烦躁等消极的情绪状态，尤其是相对独立隔绝的工业区内，个体生命被纳入工厂整体的生产流程中，原有的社会联系被切断，新的社会联系又难以建立，没有抒发情绪的适宜途径；同时，工作与生活中缺乏相应的心理支持，不仅是孤独，身边的不安全因素更让该群体觉得无助，导致消极情绪的产生。

**建议：**政府有关部门、企业、社会组织应充分关注农民工精神心理层面的需求；通过加强社会工作专业队伍建设，完善针对农民工的专业服务体系，积极开辟多元化的社会求助咨询渠道、社会紧急救援服务、企业社会工作服务，以及流动人口社会工作服务，疏导农民工精神心理压力，协助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保障农民工身心健康。

**6、感受：农民工渴望融洽的人际关系。** 大部分农民工认为自己打工所在地人情味平淡，甚至冷漠。而农民工群体在工作中，得到的来自上层管理者、企业方面的关注与支持尤为不足。尤其在机械化高强度运转的工业区中，单一的生活，快速流动的人群，无一不强化着个体间的戒备，使得农民工群体难以形成彼此间的有效支持。流水线上工作的年轻打工者则直接表示，“打工过程中最痛苦的就是上班的时候天天被老大（老板）骂。”、“有的时候感到很孤单很寂寞，想找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建议：**提升农民工的城市生活适应能力、人际关系交往能力，鼓励扶持农民工自我服务组织；在传统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引入企业社会工作；着力打造人性化的社区文化、企业文化；建立企业、社区部门、社会组织、农民工等多方参与的社区支持体系。

**7、感受：农民工渴望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随着城市建设进程的加快，城市农民工群体不断向未开发的城市边缘迁移，周边配套设施不足。且因收入所限，通常整个家庭集中居住于一个狭小的房间，居住状况差。对于工业区的打工者而言，集体宿舍、出租屋高密度的居住环境，私人空间缺失。同时，农民工聚居区普遍缺乏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场所，商业化娱乐场所如网吧、露天台球桌、卡拉OK、溜冰场等，难以满足农民工的文化需求。

**建议：**改变视农民工为“外来人口”只管理不服务的陈旧理念，把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纳入基层服务部门工作职责；以政府购买、公开竞标等方式，引导社会力量投入公共服务，实现公共服务社会化；并鼓励农民工直接参与，评估服务成效。为农民工开展综合性的社区化服务，创造条件满足其服务需求，不仅利于农民工自身的发展，更有利于城市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8、感受：农民工渴望发展规划。**农民工普遍呈现出对自己未来发展的茫然。尽管大部分农民工将“未来长远发展”视为选择工作的第一位，但对于其自身的职业发展却缺乏明确规划，大多数人模糊地将奋斗目标定位为自己创业、当老板。这个群体渴望改变，愿意付出努力以谋求个人发展，而“一无所有”、“一无是处”的茫然感却是农民工的现实。

**建议：**普遍将创业、当老板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背后折射出的是发展出路的狭窄与单一，对自身职业规划、人生规划的缺失。企业必须改变旧有的只将农民工作为廉价劳动力、不能平等提供上升空间与发展机会的用工思路；政府部门及社会组织应针对农民工进入社会后，获得继续教育机会，实现自我提升的途径提供相应支持；而乡村中学教育、职业教育，以及针对农民工的培训和服务，应注重提升农民工职业规划、人生规划的能力建设。

**9、感受：农民工渴望成就感。**尽管农民工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但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缺乏成就感与认同感，并认为社会对自己的尊重态度一般。

**建议：**将农民工视为“弱者”，隐含着对农民工“同情”、“可怜”的社会宣传，非但不能增强农民工的成就感与社会认同，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农民工的自卑与排斥，导致农民工的“被边缘化”。应提升农民工自我表达的能力，鼓励农民工自我表达，并建立农民工参与社会表达的多元途径。

**10、感受：农民工寄幸福于未来。**农民工普遍认为当下的幸福感较之从前有了很大提升，但并未提升到理想中的幸福状态；农民工普遍对未来充满信心，当下则幸福感平平。而“不幸福”的感觉呈现出年轻化趋势，尤其在刚刚开始打工生活的年轻农民工间，很多人直言当下没有幸福感。

**建议：**农民工对于幸福的期待正在提高，其需求愈发多元化，并非局限于物质层面，更希望能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生活、职业无法满足其发展的需要，不能分享社会优势资源，缺乏上升空间，这一切，都将使农民工改变自身生活的努力越发艰难，使其难以对自身的生活产生幸福感。应珍视该群体对生活、对未来的信心，加快社会政策、服务的“均等化”、“普惠化”建设；激发农民工群体的潜在能力与价值，在社会经济建设中，充分调动农民工的参与。

###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课题组

**课题组负责人：**李涛

**课题组成员：**李真，庞雯雯，卢磊，卢金艳，杨玳瑁，刘倩，王立宏，翟荣芳，王瑞海，袁晶，覃秋林，单炎斌

### 特别感谢以下志愿者的支持：

孙文娟，刘朝佑，董洪玲，姚卫，卜瑞祥，冯圆，杜鹃，李颖，李德书，邢保平，吴志葵，杨娟，张付勤，杨显定，李如，冯飞，王怀洲，江友，温海华，黄煜，韦爱整，韦利逢，汪军强，韦李红，万李泉，刘丽，杨超，李荣华，邬丽娜，文韵

（协作者之友通讯，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注明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供稿，并请告知）